

后天失调。从50年代初的社会招聘,1958年的动员中学生留校当教师,“文革”中的“掺沙子”,80年代初的“顶替接班”和长期请代课教师,直到现在派讲师团,反映了教师培训无计划、无安排,与教育发展严重脱节的情况。多数地区因教师不配套(普遍缺体、音、美、外语、史地等科教师)而不能开全课程。劳动技术课一直没有教师编制和来源。这种残缺不全的教师队伍,怎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和一技之长相结合的人才呢?

解决的办法是首先加强和改进师范教育,保证稳定的师资来源。县办师范负责小学和幼儿园师资;地(市)办师专负责初中师资;省(市)办师院和大学附设师资班负责高中和职业学校师资。中央放宽人事劳资政策,鼓励因地制宜。限期十年左右基本解决师资缺额、缺科问题。其次,采取应急措施以补救当前师资短缺和不久将面临的教师“断层”现象。下大决心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的干部(除去老弱病残者),分期分批到教育第一线从教一二年。每批抽调1/10,十年轮流一次,渡过教育的困难期。第三,加强在职教师培训,改善教师待遇。教师长期肩负着培养后一代的光荣任务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。要下大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,全面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。

相信这样坚持奋斗十几年,定会摆脱教育危机,出现教育全面振兴的新局面。

对当前我国普教现状的 一点看法和回顾

AN OPIN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IN GENERAL EDUCATION

北大附中校长 夏学之

一、对我国普教现状的看法

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

多年来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,说了不少要重视教育,尤其要重视普及教育的话,也作出了许多决议,强调要把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来抓,也做了一些实事。但是总体效应如何呢?我们知道,办教育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,但是最根本的条件还是师资,也就是得有老师,特别是要有好老师。可是至今一流人才,二流人才,甚至三流人才都不肯从教。目前教师的数量、质量严重不适应需要,

而且无论数和质都在急速下降。这就是当前教育的现状,是已经明显显示出来的危机,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危机,即使现在立即采取战略措施,已为时不早了。何况从现在种种迹象来看,尚无“亡羊补牢”之举。谁都明白,教育危机就是人才危机,就是国家、民族的危机,这是无需再争论的了。南朝鲜不足2 000万人口的小国,竟成为四小龙之一,成为体育强国,奥妙就在于狠抓教育的结果。教育投资超过其国民收入的20%。

有识之士不从教,不能怪有识之士,因为有识之士是人,是实实在在生活于现实的人,他们不能不在现实社会中采取现实的态度,权衡现实的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。因此有识之士不从教是多年来国家一系列教育政策导致的恶果,要从国策上找原因。与其回顾历史,不如看看现实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,是提出、制定出新的国策的会议。党的十三大总结、深化、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国策,归结一点,新的国策就是对外开放,搞活经济。十个年头了、开放了、搞活了,政绩卓著,可谓英明、伟大,我也十分拥护。但是在普教战线上的同志,越来越感到迷惑、费解、忧虑。

今年在七届人大、政协两个会上,教育问题成了热门话题,但是这两个会议对教育,特别是对普教,都未采取任何战略措施,令人失望。尽管教委负责人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开了两副药方:一曰,大学教师搞有偿服务,二曰中小学勤工俭学。但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两剂APC!身为教委负责人难道不知道对教育采取战略措施的紧迫性吗?中小学都靠自己勤工俭学从宏观上能自救得了吗?无怪乎,近日在报刊上看到某地区某学校全体师生停课到街上去卖烂苹果了。悲乎!

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在人代会上大声疾呼“重视教育,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”,这话说中了要害。

我们的国策是对外开放,搞活经济,这非常必要,但冷静地思考一番,似乎缺点什么,似乎有“见钱不见人”的味道。宏观管理学、战略管理学、微观管理学、教育管理学、工企业管理学,诸多管理学有一共同之大忌,即不能见物不见人(或见钱不见人)。日本丰田经验就是重视人才的发掘,培养人才,调动人的积极性,而我们的国策实际上却是见钱不见人。我建议决策者,在“对外开放、搞活经济”后面加一句“把教育搞上去。”

二、对教育的回顾

建国以来,中国教育大体上是凯洛夫教育学

的模式，近些年对赞可夫、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学说颇加赞赏，也介绍过西方教育学。陶行知先生和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也已引起注意，开始进行研究。这些年我们教育界同仁在教改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探索，颇有成绩。但是我国解放以来的教育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。因此我想着重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，回顾一下历史。

建国以来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条准则是“培养党的驯服工具”，或者是培养“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”。反正是培养“工具”，而不是培养“头脑”。其结果是在这些年代里，极左路线横行，搞什么工作都是一阵风，什么风一吹，就一边倒。将这种现象归因于驯服工具论的教育思想，大概不算过份。极左路线横行无阻，同知识分子的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不无关系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种思想为极左路线的推行提供了客观条件。1957年反右时，因为和基层党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“右派”者，为数少吗？共产党宣言，宣告了共产党人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既然为真理而斗争，那就要唯真理是从，既然如此，就没有任何理由要人们、要知识分子做驯服工具。

受驯服工具论思想的影响，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，同世界各国的差距不是缩小了，而是拉大了。我是学物理的，50年代半导体科学我们同日本同时起步，而日本现在是科技大国，工业科技强国。我们不是没有进步，也有值得人们颂扬的卓越成就。问题是别人前进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，运动学要讲相对运动，站在快者的车上看慢者的车，尽管慢车也在前进，实际上是在后退，相对距离是拉大了。

由于推行作驯服工具的教育，导致了只要共性、扼杀个性的必然后果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学说中宣告，共产主义要解放人的个性；所以扼杀个性的教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，将其归之于封建主义的教育倒比较公道。

大家都认为，多年来的极左路线使教育界成为受害最严重的部门，是重灾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从文化界教育界点的火，闹的也最凶，可是打倒四人帮以来教育界极左的东西清理过吗？没有。是不是有必要冷静的思考一下，反思一下这方面的问題？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这些年，在教育改革中大家做了不少工作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。比如关于教师的主导作用、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探索就有不少好的经验；注意提高学生的能力、培养学生的志趣爱好；培养创造型、开拓型的人才等；在教育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，多渠道办学也颇有成效。

但是，敢于创造、开拓、坚持各自的特色、

热衷志趣爱好等等，实际上都是个性的一种反映。然而，至今尚不愿提出培养和发展学生个性的问题。我认为深化教育改革，就要在教育观念方面有所突破，而发展和培养有个性的人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。要为个性恢复名誉，个性是一个褒义词，并非贬义词，个性不等于个人主义。当然个性的内涵外延，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。这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去探索，不断地去总结经验教训。

发展学生个性，是不是否定共性？否。当前有些共性的东西不是不要，而是要加强。比如：爱国主义的教育，增加民族意识方面的教育，这些东西是共性的东西，不但要，而且要加强。我认为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是个薄弱环节。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，没有爱国主义的精神是最糟的事情。1985年10月，我去过日本。他们有他们的问题，但是日本青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，强烈的民族意识。这一点我国青年不如他们。爱国主义、民族意识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。我们要强化这方面的教育。集体主义、遵守纪律等，也是共性的东西，也要加强。这些东西不能同个性对立起来。要清除驯服工具论的影响，发展人才个性，教育我们的学生唯真理是从。我们的知识分子，我们的青年也都应唯真理是从，而不是唯其他的东西是从。那样，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，才能有生命力、创造力，才能开拓前进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；才能成为时代的强者，自立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教育是祖国的未来，祖国的希望。教育者是神圣的，我们要肩负振兴民族的重任，为民族的未来负责，哪怕我们只在一个学校里仅仅起到了我们应有的有限作用，也是神圣的。

采取特殊途径，筹集教育经费

MUST TAKE SPECIAL MEASURES TO COLLECT TH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

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校长 郝守本

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教育形势，有人认为教育存在着“滑坡”的危险；也有人认为教育处在改革中的完善过程。见仁见智自然各有所依。但是由于教育中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如不重视，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素质的优化和社会道德水平的